

瑞
《李自成》及其他

思基



春风文艺出版社

I207.4/2

论《李自成》及其他

思 基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沈阳

769199

论《李自成》及其他

思基 著

*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六六七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 插页:2

字数:162,000 印数:1—5,000

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58·560 定价:0.62元

目 录

第 一 辑

论《李自成》的艺术创造	(3)
第一章 在生活的大海中航行	(3)
第二章 洪流不可阻挡	(28)
第三章 历史是无情的	(52)
第四章 布局·对比·音乐旋律	(70)
必要的题外话	(96)
论杜鹏程艺术的独创性	(101)
再论彭总的形象	(123)
值得重视的探索	(137)
悲忿的挽歌	(156)
象惊雷，象闪电	(161)
九年的灵魂写照	(162)

第 二 辑

坚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文风	(171)
紧握这支枪	(183)
镜子	(190)
他的过去和现在	(195)
砸烂镣铐和枷锁	(207)
编后记	(220)

第 一 辑



论《李自成》的艺术创造

第一章 在生活的大海中航行

文学是生活的反映。作家必须描写他自己最熟悉的生活。

《李自成》第一、二卷问世之后，激起了广大读者的极大关注，一时成了亲友之间互相寄赠的珍贵礼品。偶一获得，都日以继夜，手不释卷地争相阅读。阅读之间，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作者生活在今天，怎么把三百年前的斗争生活写得如此真切？而且涉及到的生活范围又是那么广阔：上自皇帝、后妃、太监、朝臣、巡抚、总兵、知县，下至巫婆、绳妓、铁匠、饥民，三教九流，无不绘色绘声，各显特异。作者哪能熟识这么多人物？文学是反映生活的，作家是怎样了解这些生活的？这的确是我们应该研究的问题。因为文学反映生活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根本原则，也是现实主义的基本前提。鲁迅说：“天才们无论怎样说大话，归根结蒂，还是不能凭空创造。描神画鬼，毫无对证，本可以专靠了神思……然而他们写出来的，也不过是三只眼，长颈子，就是在常见的人体上，增加了眼睛一只，增长了颈子二三尺而已”。^① 所以不论作家写的是人是鬼，是古是今，都必须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出发。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写的是神仙狐鬼的故事，吴承恩的《西游记》写的是

① 《叶紫作〈丰收〉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175页。

孙悟空和妖魔斗法的故事，但因它“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①对事对人又都包含着作者自己的期望，所以神仙狐鬼“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②孙悟空虽系猴子，因为他喜爱自由，坚持正义，反倒令人倍加亲切，生动感人。这说明创作即使“描神画鬼”，只不过是常见的人体身上外加一些鬼神色彩而已。它的根本东西，还是作家自己最熟悉的生活。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所以毛泽东同志说：“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③任何为广大群众所欢迎的作品，都必须扎根在作家自己所最熟悉的生活之中，对那种生活和思想，表现得越深刻，它就越富有艺术的生命力。《创业史》的作者柳青同志，坚持扎根于生活，这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他为了反映陕甘宁边区的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一九四三年曾背着行李到米脂县一个乡里去当乡文书，不管生活怎么艰苦，一直坚持了三年。为了研究社会主义农村变革，一九五二到一九六六年又全家搬到长安县皇甫村一个古庙里，同那里的群众一起生活了十四年。他的《种谷记》和《创业史》就是在这些生活基础上创作的。他在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时说：“要想创作，就先生活”，“生活培养作家，生活改造作家，生活提高作家”。这是一条成功的作家的创作道路。

姚雪垠同志写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当然也不例外。

①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8卷第130页。

②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8卷第171页。

③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817页。

生活就象海洋，作家的创作就象在自己的生活海洋中航行。不过写历史小说的生活领域和反映现实生活又不完全相同。作家除了自己的生活经历，还必须对历史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

姚雪垠同志出生在民国初年，十岁以前在农村，十岁以后在城市，当过北洋军阀的兵，十四五岁又曾在土匪中生活过一百天，懂得些绿林生活。从青年时代起，他又喜爱历史和文学。他遍阅了多种史籍和文学作品，许多东西都能逐一背诵。这给他写《李自成》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李自成》的生活基础，就是他的渊博的历史知识，丰富的文学遗产，和他自己饱经风霜的生活经历的总和。

—

要写历史小说，深入历史，是解决生活问题的第一步。姚雪垠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到他着手《李自成》的创作止，前后经历了近四十年的时间，阅读了大量的历代农民革命运动的史料，和有关明末李自成起义的各个方面的书籍。不管是记述农民起义的，还是记述崇祯统治集团镇压农民革命运动的，他都逐一加以研究和分析。同时，对一些与当时生活有关的资料，如扇子、茶壶、字画、家具、服饰等等，也都加以搜集。连崇祯那“朱红盘龙柱子旁边”的牡丹，也都是有它的史料根据的。因此，仅仅有关《李自成》的创作卡片，姚雪垠同志就积存了一万多张。卡片分门别类，排列有序，在作家的手下，象一支整装待发的大军，随时听候着传令调遣。卡片采有各种不同观点的材料，供作家分析、研究使用。比如关于农民军领袖人物的重要活动，某些重要战役，某些需要澄清的历史问题，都立有专题。往往在一个题目之下，积累了几十张或上百张卡片。甚至有些历史事件，如天启年间的徐鸿儒起义，崇祯十一

年的湖南临蓝矿工农民起义，作者明知在小说中不会去写，但也抄录了许多卡片，为的是有助于他弄清楚明末农民起义的整个历史形势，既要具备纵深的了解，也要注意广博的知识。这些都是作家“对于认识生活”所下的“笨功夫”。有了这些知识，再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进行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那些生活在三百年前的李自成、李信、崇祯、洪承畴等正反两方面的人物，就会呈现出他们历史的本来面目。有些问题，作者还作了专题研究，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这对于掌握人物的思想、性格，也都是极为有益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形象是在深入历史的基础上得来的。《李自成》中许多栩栩如生的形象，正是作家扎扎实实，一丝不苟，深入到浩瀚繁复的史籍材料中寻找出来的。他们都有着自己的历史依据。

但是，小说不是历史。作家并不能完全按照史料写作，在深入历史之后，还得跳出历史。

《李自成》并不单是为了要给李自成这个明朝末年的农民革命英雄树碑立传。崇祯形象的出现，也不单是为了要把崇祯那个封建统治头子拿来给群众鞭尸。作者是要通过李自成同崇祯的斗争，写出中国封建时代农民战争的基本规律。因此，李自成虽然是明末战争的领袖，同时又是吸取了历代农民军领袖的斗争智慧的英雄。他的“剿兵安民”，“均田免粮”，爱惜民田、兵农相兼等革命措施，实际上是黄巢、王小波、方腊、钟相、杨么、刘福通等农民军行动口号的继续。崇祯对农民军的残忍杀戮，聚兵围困，收买叛徒，派遣奸细等一整套卑劣作法，也是继承了李隆基、赵佶、赵构、察汗帖木尔等人的反动衣钵。因为双方都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它的斗争规模、战争的残酷性，自然也就是空前的。《李自成》一开始就在潼关南原大战上落笔，除了要把主人公及其周围人物放在生活的惊

涛骇浪中去进行锤炼，表现这些人物是压不垮、砸不烂的钢筋铁骨之外，同时，也显示着这是一支为历代农民武装的传统经验所养育出来的集体。他们相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不会就此失败的。李自成同高一功的谈话，正表明了他们从传统经验中所继承下来的这种精神。

闯王在他的床边坐下，安慰说：

“一功，你不要为咱们打了个大败仗灰心。刘邦同楚霸王打仗，连自己的父亲和女儿都给霸王俘去，可是后来终于得了天下。眼睛要往远看，别看目前一时。”

高一功叹口气说：“虽说胜败兵家常事，但不知天意如何。”

自成说：“天意就是民心。只要看看民心背叛情形，就知道朱家的江山坐不长了。”

李自成的这种精神，史料里虽然也有记载，如《延绥镇志》中写道：“自成曰：‘昔汉沛公百战百败而得天下，汝一知之乎’”。但作为小说里的形象，它已经不完全是史料的翻版，而是综合了历代农民义军领袖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融汇在李自成的血液里。它既是历史，又不是历史，既是真的，又是假的。它包含了作家对这个人物的想象和夸张，只不过寄托着一件实有的史料表现出来而已。

作家跳出历史，首先是跳出那些真伪难辨的史料，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进行科学区分：什么是封建统治阶级对于农民义军的诬蔑、丑化，什么是真正可信的历史。李自成的史料，散见于各种正史、野史、杂记、史钞……，要从中辨出真伪，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姚雪垠同志对他所写的每

一事件，每一个人物，都是从大量史料中经过精细的分析，选择其最可信的材料作为自己的创作依据的。比如车箱峡之战，到底是顾君恩献策使农民军逃出了困境，还是李自成使计保全了农民军的实力？在小说第一、二卷中寥寥数语，只是作为李自成的一次战功，补叙他对农民军的贡献。但就这一点，作者也从多方面进行了有理有据，实事求是的分析。他从顾君恩于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在襄阳建立中央政权时只任兵部从事，这之前史料中没有记载过他有任何活动，推断顾君恩在车箱峡根本就不可能有那么重大的贡献。李自成也不可能让新投降的喻上猷任兵部侍郎，而让一个有过重大贡献的顾君恩在他手下当一个小小的六品官。这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他又分析到，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来说，经过明朝二百七十多年的统治，正统观念是比较强的，在农民军还没有占绝对优势的时候，参加起义不但要承受“乱臣贼子”的千古骂名，还要冒家族被诛的风险。因此，崇祯十一年以前，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很少有科举功名的人参加革命运动。十一年以后，农民军声势越来越大，崇祯的江山越来越不稳，有些地位低、受官绅压迫的知识分子才开始走到革命队伍中来。顾君恩是个拔贡，怎么能在崇祯七年，农民军常常吃败仗的时候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来？作家的这些分析是科学的，令人信服的。这分析，已为《钟祥县志》所证实：顾君恩是在崇祯十六年初李自成破钟祥时参加起义的。由此可见，一个写历史小说的作家，除了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还必须具有科学的历史唯物论的分析方法，才不致坠入复杂纷纭的历史资料的迷雾中，才能真实地再现历史。

李信在农民军中的作用，史料中也是众说纷纭的。较多的流行说法是李信参加起义军以前，李自成的政策观念是很差的，所到之处，随便杀人；李信参加之后，劝他施行仁政，他

才整顿军纪，改善同群众的关系。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把李自成当作祸国殃民的“流寇”，而把大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看成是改造这支“流寇”队伍的核心人物。这就夸大了李信的作用，似乎没有他就没有李自成的大顺江山。其实许多史料证明，崇祯十三年前，即李信参加革命之前，李自成起义军就在当时的十三家七十二营中享有军纪严明的声誉。作家列举了许多史料证明，李自成义军在李信参加之前，决不是一群乌合之众。一是崇祯八年，明朝御史邓启隆在奏疏中说：高迎祥农民军（李自成是其中的劲旅）“所到之处，民无不望风相迎，甚有望其来而恐其不来者”；二是崇祯九年五月，李自成一举歼灭了延绥总兵俞骊霄，回到米脂，围而不攻，把明朝知县边大绶叫到城上告诉他：“此吾故乡也，勿虐我父老”，又给他银子叫修缮文庙，“使从乱者益众”（《平寇志》）；三是崇祯十三年以前李自成就提出了“剿兵安民”的口号，在“贼过如梳，兵过如篦”的崇祯年代，这是一个深得民心的政治口号；四是计六奇在《明季北略》中记载，李信投奔义军后同李自成的谈话说：“将军冬日在人，莫不欣然鼓舞，是以率众数千，愿效前驱。”如果李自成随意杀人，他哪能把闯王喻为冬天温暖人的太阳呢？

姚雪垠同志的这些分析，不仅澄清了各种史料的真实价值，证明了统治阶级御用文人的思想观点对于我们现代的史学家还有着无形的影响，而更主要的，是通过分析，把李自成农民军的人民性和革命性肯定了下来，从三百多年的各种史料迷雾中按照他本来面目把李自成的形象突现出来。因此，作家在小说中，浓墨重彩，刻划李自成在商洛山中整顿军纪，平买平卖，严令维护群众利益，挥泪斩李鸿恩等等，就显得非常重要。它是表现这支农民军队的根本性质的重要情节，也是对于

某些史家观点的批判。

小说中，关于红娘子史料传说，作家也作了极其重要的改正。据《明史》和一些野史记载：红娘子原是一绳妓，后来造反。杞县举人李信被她掳去，强迫成婚。李信出身官宦，不从，逃跑了。后李信被县官以通贼囚禁，红娘子又率众将他救出，一起投奔了李自成。按这种说法，红娘子只不过是一个江湖女流氓，或占山为王的女“草寇”。这既丑化了红娘子，也丑化了这一支义军。姚雪垠同志采用了这些史料的情节，改变了它的内容。在他的笔下，她立身清白，性格豪爽，“弓马娴熟，武艺超群，虽然漂泊江湖却不同于一般的绳妓”。她是历史上迟昭平、陈硕贞、唐赛儿、杨寡妇军等巾帼英雄的反抗精神的继续。这就赋予了她新的生命。高桂英、宋献策对她和李岩婚姻的关切，在李自成破了洛阳以后，又在炮声隆隆为她们安排隆重的婚礼，实是对于封建文人对红娘子这个传说中的人物的丑化的严厉批判。

“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是作家摄取史料的基本出发点。为了表现李自成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指挥若定的统帅才能，以及农民军将校在进行斗争时的英雄气概，作者摒弃了许多歪曲丑化农民军的传说。“鱼复山”被围，便是最典型的例子。《明史·流贼传》载：

……官军围自成于巴西鱼复山中，自成大困，欲自经，养子李双喜劝而止。贼将多出降。刘宗敏者，兰田锻工也，最骁勇，亦欲降。自成与步入丛祠，顾而叹曰：

“人言我当为天子，盍卜之？不吉，断我头以降！”宗敏诺。三卜三吉。宗敏还，杀其两妻，谓自成曰：“吾死从君矣。”军中壮士闻之，一多杀妻子愿从者。自成乃尽焚

其辎重，轻骑由郾、均走河南。

这史料，显然是封建文人对李自成农民军的诬蔑。兴安县车箱峡被围，“人马缺吃，弓箭脱胶”，几乎全军覆没，都毫未减弱它的锐气，在鱼复山遇到一个陈奇瑜围了几天，怎么就一个想死，一个想降？显然这和他们在整个战争进程中的表现是不相称的。作家从他们整个斗争历史进行分析，摒弃封建文人的诬陷之词，勾沉刊谬，拨乱反正，把李自成置于可靠的历史基础上，对于他们的形象塑造是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

小说创作，光靠史料的真实是不能完成其形象的塑造的，它需要许多丰富的情节、生动的细节、生活的场景，把人物从各种矛盾中展现出来。这样，人物的形态、声音、容貌、思想才能有血有肉，具体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没有这一步，事实考证得再准确，它也仍然是历史。历史的任务是证实史实的存在，而不能形象地再现历史。小说则要求作家形象地把历史生活再现出来。这样，作家就必须跳出历史的史实，根据历史运动的规律、人物性格的特征，用作家自己的虚构和想象补充历史。只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可能产生的，合情合理的，并为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所必须的，就需要充分发挥作家的艺术才能，把人物的思想性格表现得极其生动和饱满。《李自成》第一二卷问世以后，人们竞相争读，其心情不在于要了解它所提供的史料是否准确，而是关心李自成、刘宗敏、高桂英、郝摇旗和崇祯、杨嗣昌、洪承畴等等不同的人物在被作家通过虚构所网织起来的巨大结构中，他们各人不同的命运。他们将向何处去？封建制度带给了他们什么？他们又在这沉重的锁链禁锢下，从自己不同的阶级地位出发，如何挣扎、斗争、想要给自己争得一个更加适意的处境。每个

人物的这种内在精神，以及为了充分表达人物的这种精神所需要的戏剧情节，历史留存下来的任何资料，都是不可能代替作家去实现自己的意图的。历史资料，只能通过作家细致周密的想象和虚构，才能把各种死的历史资料变成完整的表现人物思想感情的活生生的细节。这是历史小说创作的核心环节。作家才能的大小，也就在这个环节里表现出来。一个题材，不同的作家，可以写出不同的作品来。它的关键，也在作家进入创作时，处理材料的能力。姚雪垠同志在《李自成》的创作中表现了他的想象和虚构的巨大才能。潼关南原大战、商洛壮歌、紫禁城内外，李自成谷城夜会张献忠等那些惊心动魄的篇章，都是作家根据当时的史料和表现农民革命战争发展的需要，通过丰富想象虚构出来的。潼关南原大战，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这一件事情。《明史》只载：李自成崇祯十年冬已同过天星等入川。十一年春“承畴、传庭合击于潼关南原，大破之。自成尽其卒，独与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骑溃围，窜伏商洛山中……”。潼关南原之战，显然是四川梓潼原之演绎。因为《潼关卫志》和《李自成传》都根本没提到有潼关南原那场大战。但作家为了让李自成等农民军英雄一出场就置身在两个阶级、两种力量的大搏斗中，显示这场战争的严酷性，根据那些不准确的史料，将错就错，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和虚构才能，把这一次战役写得腥风血雨，激越感人。李自成、刘宗敏、高桂英、郝摇旗等英雄人物，为了推翻朱家王朝，临难不惧，视死如归，在刀光剑影中，一个个勇敢、果断、坚定、沉着，把洪承畴、孙传庭用重兵设下的埋伏圈，砍杀得七零八落，残破不全。震撼人心的商洛保卫战，更是作家为了展示各路英雄的奇才，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才能，把英雄人物置于极端困难的错综复杂矛盾中。他们在官军压境的重重围困下，既遭时疫的折磨，又出现

杆子的哗变，宋家寨地主武装对农民军的暗中收买，更使形势变得千钧一发。李自成、刘宗敏等拖着疲惫的身躯，如何摆脱这种困境，读者莫不为之焦急。然而，作家正是在这种紧急复杂的矛盾中，表现了自己人物的杰出才能。李自成本身赴石门谷处理杆子哗变，分化瓦解杆子队伍，并以快刀斩乱麻的果决手段，在一夜之间把一场眼看就要使保卫商洛山之战的全盘计划付之一炬的灾祸，兵不血刃地平息了下来。几笔就把李自成的雄才大略勾画出来。素称骁勇悍战的刘宗敏，在敌人阴谋把他的老营变成摧毁农民军的开花炸弹时，他却以口吐鲜血，昏厥不醒，使狡猾的宋文富、马三婆之流伸着脖子往他安排好的绞索套里钻。这样刘宗敏不但是一个骁勇善战的虎将，也是一个深具韬略的帅才。李过躺在兜子上巡视战场，孤军深入敌人境内，冷静、沉着，任其敌人狂喊，直到官军眼见就要扑到自己面前，才给敌人猛然袭击，创造了一种奇特战法，把优势官军追撵得鬼哭狼嚎。一只虎变成了智囊袋，给人以奇才突现之感。这些都是作家根据史料，通过自己的想象和虚构，把死的历史资料变成活的历史，把历史科学变成再现历史生活的历史小说。没有虚构和想象这个环节，就不会有《李自成》中各式各样的活生生的人物的出现。没有想象和虚构也就不会有小说中那么集中，那么互相关联的情节的出现。潼关南原大战，商洛山保卫战也就不会成为作家铺写李自成农民军临难不惧，敢于斗争的高昂的英雄进行曲。这是作家跳出历史创作《李自成》的重要手段。

二

历史小说写的既然不全是历史，那么作家的想象和虚构的生活根据是什么呢？回答只能是这样，是历史，也是作家自己